

當大家翻閱本期雜誌，應該臨近聖誕。按基督宗教傳統，這是個充滿和平、盼望與歡悅的節期，對處身喧嚷紛擾世代的我們尤顯重要。藉此佳節，編輯室同仁祝願讀者諸君平安喜樂。

——編者

## 滿族被「漢化」了嗎？

清史學者劉小萌與歐立德 (Mark C. Elliott) 關於「滿族研究」的對話〈從「新清史」到滿學範式〉(《二十一世紀》2016年10月號)，涉及多個主題，如「意義與範式」、「中西視角的異同」、「漢化」以及「學術與政治的關係」。

「新清史」研究最著名的爭論是文章中提到的何炳棣與羅友枝 (Evelyn S. Rawski) 討論滿族的「漢化」問題。「何羅之爭」孰是孰非？歐立德認為「各有道理」，只在於「他們對『漢化』這個詞的不同理解」。然而，英文學界多數學者認為羅友枝不僅完勝，亦確立了「新清史」研究成為新的典範。相反，中文學界則認為羅的批評迹近立異鳴高，而何的觀點才是持平之論。分歧何以如此之大？除了中西在一些概念上，比如對「帝國」一詞定義不同外，劉小萌指出了雙方在滿族研究的立場差異：在滿漢關係上，美國「新清史」的關注點「不是民族的融合，而是民族的對立」。

要解釋何以美國的「新清史」強調民族「對立」，首先需要了解美國民權運動以來對「少數

# 三邊互動 三邊互動 三邊互動

族裔」權利的強調。在此思潮下，對滿漢關係的研究更傾向於強調作為少數民族的滿族的獨特性，以張揚在大漢族宰制下的滿族的權利。同時，孔恩 (Thomas S. Kuhn) 的「範式轉移」理論也提示我們，新範式取代舊範式，只是在學術生產機制上新生代學者為了創新的需要立異而已，「滿族中心」的範式取代「漢化」亦可作如是觀。

中國學者強調民族的「融合」則有不同原因。學術自由的不充分固然是一個因素，但中國學者在研究本國史時所強調的「經世」意識以及「大一統」觀念才是更大的社會背景。今天中國學者在研究滿族時，關心的大問題仍是民族如何融合，搏成「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即使提滿漢的衝突，也是希望從歷史中汲取教訓，進一步改善民族關係，卻不願強調滿族的獨特性，惟恐給「分離主義」提供了學術理據。

如此，中西學者該如何對話？學習西方固然必要，但問題意識卻要立足中國的語境，既要有國際眼光，又不放棄中國的主體性。

毛昇 費城  
2016.10.17

## 比較視野下的僑民文化史

黃紹倫的〈魂歸何處：中印僑民探微〉(《二十一世紀》2016年10月號)從喪葬文化切入，對中印兩國的僑民心理和行為模式進行比較，進而從兩個民族文化(儒家和印度教)的根本上進行比較。前者懷有家國之情、注重家族責任，而後者則信仰梵的永恆精神、期待死後世界和超越輪迴。這兩種不同類型的文化，是海外僑民賴以安身立命的精神支柱。

文章從幾個方面做了探討。首先，土葬和火葬構成兩種文化的異同。華人選擇土葬並將遺體運回故土，而印度人的火葬則由於不易在異鄉操作，因而以土葬代替；其次，對亡靈的不同祭奠。華人堅持在特定日期進行祭奠，甚至按照活人風俗祭奠亡者，而印度人由於信仰緣故不會表現得如此執著；第三，海外賺錢與反哺故里的關聯。華人大都寄錢回鄉，也通過燒冥幣增強自己在家鄉和家鄉的地位，而印度勞工同家鄉的關係比較鬆散；第四，社交網絡和群體關係。華人通過血緣和地緣的關係同家鄉密切關聯，而印度人關心的是在種姓階梯上的升遷。

一般而言，中國是以家族為紐帶，而印度則更注重種姓。在做出這種二元化劃分的同時，還要考慮一些非典型的情況，如不同地域、不同信仰對兩國移民的影響有何差異；並且要考慮英帝國在東南亞建構的網絡，印度人和華人對這張網絡的利用程度是不同的；還有「國族神話的強化」以及二戰之後局勢變化在中印移民之間產生的差異。

朱明 上海  
2016.10.20

## 民眾抗爭背後的精英互動

在有關中國抗爭政治的文獻中，很少有研究探討衝突中流動着的精英力量及其間的相互博弈。李連江和劉明興的〈吏紳共謀：中國抗爭政治中一隻隱蔽的手〉（《二十一世紀》2016年10月號）一文，填補了這一議題的空白。該文推進了李連江在前期工作中的「分解國家」的努力。如果說在「依法抗爭」模型中，他將國家拆分為不同層級的政府，分析層級間的利益分化給抗爭者提供的政治機會，那麼本文則進一步指出拆分地方政府的必要，因為同一層級的政府中存在「官」與「吏」的區別。

作者生動地描述了流動的官與固守的吏之間的矛盾，探討了本地幹部與社會精英建立聯盟並借力民眾抗爭保護雙方利益的過程，分析了國家權力與社會力量交匯互動的政治功能。首先，該文提出的吏紳共謀框架全面地關照了地方政治的主要博弈主體，展示了「官」、「吏」、「紳」、「民」四者間的互

動與博弈。其次，該文指出了地方政治中強勢精英（官）和弱勢精英（吏）各自的優勢。另外，該文探討了吏紳共謀的顯功能和潛功能、短期作用與長期後果，為我們認識地方政治的區域差別提供新視角。

在肯定之餘，我們提出以下幾點以供商榷。首先，「官」、「吏」、「紳」三者的邊界可能需要進一步明晰。例如文中提及的楊維駿是退休多年的副省級領導幹部，將他作為吏的代言人值得商榷。從級別來說，楊更像是官；但從身份來看，他則更接近於紳。其次，在區別目的型和工具型的吏紳共謀時，至少採用了三個標準：（1）是否涉及利益；（2）民眾抗議在前還是在後；（3）官的身份。至於這三個維度是否可以同時使用，值得進一步思考。再次，後續的研究可能需要依結果區分吏紳共謀。本文主要研究了成功的吏紳共謀，那麼如果合謀失敗，「吏」和「紳」將分別面對何種後果？上層政府又是如何回應結果不同的吏紳共謀？

鄧燕華 南京  
梅賜琪 北京  
2016.10.22

## 被驅逐者的歸來

斯洛文尼亞哲學家齊澤克（Slavoj Žižek）在影片《變態者意識形態指南》（2012）中指出：「只有在電影裏，我們才能獲得那個至關重要的維度——那個我們在現實中沒準備好面對的維度。假如你在現實中尋找比現實更真實的東西，去電影的虛構裏找吧。」在他看來，

電影具有真正且完整展現我們所處現實的特殊力量，即對於「物自體」的再現。在〈再現「不可見」之物：中國科幻新浪潮的詩學問題〉（《二十一世紀》2016年10月號）一文中，科幻小說同樣擁有對於「不可見」之物的再現能力。宋明煒通過對兩位著名科幻作家作品的分析，揭露出二者通過不同方式來展現當下中國現實中的「不可見」之物：「主流文學秩序之外『不可見』的現實」。

筆者一直覺得，人們對於科幻文學的理解太過狹隘，大都故步自封地為此劃定邊界，但如果越過這些邊界來回顧整個文學史的話，從卡夫卡（Franz Kafka）的《變形記》到奧威爾（George Orwell）的《1984》以及拉美文學大爆炸中誕生的魔幻現實主義，他們和宋文中所分析的韓松與劉慈欣的創作並無二致，都在通過一個新的視角來揭開覆蓋於我們所見現實之上的蓋子，窺探那些「不可見」之物。余華的《第七天》不也是在如此嘗試嗎？

在當下中國，科幻文學因為一些優秀創作者的努力而再次回歸大眾視野並得到研究者的關注，再沒有甚麼比曾經被驅逐、被打壓的邊緣者的歸來更讓人期待和興奮了。科幻文學以其優勢和一種局外人的挑釁，在這塊眾聲喧嘩但又無比沉默、壓抑而悲哀的荒野裏，撕開被技術和權力規訓的沉重面具，展現出那些「不可見」之物的扭曲甚至是恐怖。

宋傑 南京  
2016.10.20